遗址类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

——以盘龙城博物馆为例

贺林琳[1]

(1.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遗址类博物馆兼具以物证史、文明阐释与社会教育功能，是推动中华文明历史叙事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相衔接的重要公共空间。本文以盘龙城博物馆为例，运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从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实践及优化路径三个方面，探讨遗址类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研究发现，盘龙城博物馆依托城址遗存、青铜礼器等考古资源，通过展陈讲解、公共考古和研学活动等形式，推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向公共教育资源转化。基于此，提出深化跨区域文明比较叙事、创新数字化传播方式、拓展沉浸式教育体验、完善教育评价反馈机制等路径，以期为遗址类博物馆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遗址类博物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盘龙城博物馆；教育路径；文化遗产

DOI：doi.org/10.70693/202611092991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o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A Case Study of Panlongcheng Museum

He Linlin[1]

1.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Hubei,China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serve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providing historical evidence through material remains, interpreting civilization, and delivering public education. They constitute important public spaces for connecting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Taking Panlongcheng Museum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o explor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o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nlongcheng Museum draws on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including city site remains and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publ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exhibitions and guided tours, public archaeology, and educational study program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approaches, including deepening comparative narratives of cross-regional civilizations, innovat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expanding immersiv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improv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These approaches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in conducting

作者简介：贺林琳（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现实问题研究。

education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anlongcheng Museum; educational approaches; cultural heritage

一、问题提出

遗址类博物馆既保存考古遗存，又承担历史阐释与社会教育责任。与以可移动馆藏为主的综合博物馆不同，它具有遗址本体、出土文物及周边历史空间相互关联的资源条件，能够使观众在具体场所中理解历史证据的生成过程。如何将这一现场优势转化为教育资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关注博物馆的集体记忆、认同叙事及“有形有感有效”的教育要求[1]，但部分论述仍容易由“资源丰富”直接推及“认同增强”，缺少对考古证据如何进入公众理解的中间环节的分析。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商代前期城址，其城垣、墓葬、青铜礼器及多材料饰件，为讨论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提供了具体材料。盘龙城博物馆既可以呈现地方城市历史，又可借助遗址现场与陈列空间解释早期区域文明交流。本文以其为案例，通过文献梳理、展陈内容分析，围绕“为何具有教育价值—以何种资源承载—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展开讨论，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遗址类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逻辑

遗址类博物馆的教育优势并非仅在于文物古老或遗址规模较大，而在于能够同时呈现原生空间、出土背景及相关历史解释。以盘龙城为例，城址与墓葬构成证据现场，青铜礼器与绿松石饰件提供物质文化线索，展陈与讲解则使分散材料获得叙事联系。因此，遗址类博物馆的教育路径应遵循由实物证据到文明认识、再到文化意义理解的递进逻辑，在知识准确性与价值阐释之间建立可追溯的联系。

（一）考古遗址为中华文明历史认知提供实物依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以可信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交融发展形成的文明形态。考古发现作为还原历史本真、实证文明脉络的第一手资料，清晰勾勒出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凝聚的完整轨迹，为理论阐释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支撑。遗址现场具有不可替代的空间性，城垣位置、建筑遗迹、墓葬分布与器物出土关系，使特定时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不再只是书面概念。遗址类博物馆可以通过遗迹标识、发掘记录与文物原位信息，向观众说明考古结论从何而来，引导观众将认识历史叙事建立在实物证据和科学解释之上。

实物证据的阐释还须遵守“史论结合”的原则。对于青铜器形制相近、建筑布局具有相似性等现象，博物馆可以据此讨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的技术传播、制度联系或文化互动。通过区分考古事实、比较分析与学术推断，博物馆既能够提升公共历史教育的可信度，也能够引导观众形成以证据理解历史的认知方式。这是文化遗产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的首要前提。

（二）区域文明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既表现为不同区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历史面貌，也表现为持续发生的交流、影响与相互联系。因而，“多元”与“一体”不是彼此隔绝的两个特征，而应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加以理解。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研究提示，博物馆不仅应呈现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还应说明地方历史如何进入更大范围的文明演进，以克服由展品碎片化导致的历史认知割裂[2]。

在具体阐释中，一方面可以围绕相同或相近的器物类型、技术工艺和礼仪形制，揭示跨区域共享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地方社会的生产条件、资源优势及审美实践，说明地域差异及其在交流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仅强调某一文化向另一地区的单向传播，便可能遮蔽不同区域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主动参与。对盘龙城案例而言，既要讨论其与中原商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应考察

江汉地区的本土特点以及长江流域在物质资源和工艺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共性与差异并置的比较叙事，历史文化资源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三）历史知识的教育转化促进文化意义理解

历史证据的存在及其学术解释，并不意味着观众自然能够建立中华文明整体性认识。考古材料往往具有知识门槛，文物的形制、纹饰、用途及其历史背景，需要经过展陈选择、讲解组织和教学活动设计，才能成为易于理解的公众教育内容。相关研究强调博物馆在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及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阐释作用[3]。由此可见，博物馆的教育支持功能在于架设考古知识与现实文化理解之间的桥梁。

这一转化至少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一是通过展品来源、遗址背景和考古成果说明“历史事实是什么”，二是借助时空对照、器物比较和叙事脉络解释“不同区域为何发生联系”，三是通过问题导向的讲解、研学活动与参与式体验引导观众思考“这些联系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历史认知、文化意义建构与可能的情感认同在此形成由浅入深的教育路径。

综上，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支持逻辑，可概括为以实物证据形成历史认识，以区域互动阐释文明整体性，以教育传播促进文化意义理解，为分析盘龙城博物馆的资源基础与展陈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视角。

三、盘龙城博物馆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资源基础

遗址类博物馆的教育内容应建立在遗址本体和考古材料的特征之上。盘龙城的城址空间、礼制器物和复合工艺，分别连接着区域社会发展、跨区域文化联系与物质技术交流三个层面[4]。将其组织为相互补充的证据链，既能够避免展品介绍碎片化，也能为观众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提供具体切入点。

（一）商代前期城址呈现长江中游早期社会的发展面貌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距今约 3500 年，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商代前期城址。遗址发现的城垣、建筑基址、墓葬及各类生产生活遗存，为认识江汉平原早期聚落形态、社会分化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盘龙城因此不仅具有“武汉城市之根”的地方性意义，也为观察商代前期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城址遗存所揭示的历史信息，首先体现为地方社会自身的发展水平。大型建筑、城垣与不同性质的墓葬遗存，提示当时盘龙城已经形成较为复杂的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形态[5]。相比只讲述“武汉城市之根”的地方历史叙事，从聚落布局、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展开解释，有助于呈现江汉地区在早期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盘龙城与二里岗时期商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使这一遗址成为比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重要对象。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的角度看，城址遗存能够回答两个基础问题，即长江中游地区在商代前期已经发展出何种社会形态，以及这一地方性发展如何与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相联系。通过空间格局、遗存类型与时代背景的结合，盘龙城博物馆能够将地方城市记忆纳入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脉络。

（二）青铜礼器组合反映区域间的礼制文化联系

青铜礼器是盘龙城遗址极具代表性的文物资源。出土的鼎、爵、觚等器物在器类、纹饰和组合关系方面与中原商文化存在明显联系，为研究礼制观念、器物制作和区域文化互动提供了具体材料，相关考古研究也已对盘龙城商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作出讨论[6]。由此，青铜器不仅是展示古代工艺技术的实物，也可作为解释不同地区共享文化符号及其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证据。

理解这些礼器的意义，需要由单件器物上升到器物组合及其考古情境。相同形制的器物在不同墓葬和遗址中出现，能够为考察礼仪实践与社会等级提供线索。器物的纹饰、制作工艺和使用情境，则有助于分析技术风格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将盘龙城出土礼器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同类材料进行比较，能够说明长江中游与其他区域在商代前期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存在可以从物质文化中观察到的历史联系。因此，青铜礼器教育资源的重点是展示“共同性通过何种历史联系形成”，为解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特征提供事实基础。

（三）多种材料与复合工艺折射早期文明的交往交流

除城址和礼器之外，金属资源、绿松石材料及复合工艺同样是理解盘龙城历史文化价值的重

要线索。商代青铜文明的发展依赖矿料获取、冶铸技术及相关物资运输与分配，不同区域之间可能存在多层次的资源与技术联系。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龙形绿松石镶金饰件，为观察材料组合、工艺能力与象征表达提供了鲜明个案。该器物将绿松石与金质材料组合使用，呈现出较高的制作水平，引出关于材料来源、工艺传统和社会文化意义的进一步讨论，对其出土背景、材料属性、制作流程及可比较的相关器物加以分析，更有助于说明不同地域技术与物质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资源与工艺视角使盘龙城的历史解释能够兼顾生产技术、物质流通及地方社会的参与。由城址所反映的区域发展，到青铜礼器所显示的文化联系，再到多种材料器物所提示的技术交流，三类资源共同构成了理解早期中华文明多区域互动的证据网络[7]。对盘龙城博物馆而言，其拥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资源优势在于能够以具体器物和遗址事实，支撑对中华文明区域联系与整体发展的历史阐释。

四、盘龙城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

（一）关联遗址现场与展厅叙事建构整体历史认知

遗址类博物馆的重要特点，是遗址现场与室内陈列可以相互印证。盘龙城博物馆基本陈列包含“浪淘千古”“故邑风物”“角立南土”三个展厅，分别从考古发现、城邑生活与区域文化联系等方面展开叙事。这一叙事路径的核心是解释“地方历史何以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部分”。以盘龙城青铜礼器为例，展陈既比较其与中原同类器物的形制共性，也解释出土情境和地方差异，使观众能够从“看一件文物”进入“理解文物所处的历史场所”，形成现场感知与整体认知相结合的学习过程[8]，为观众建立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认识提供条件。

（二）依托多元教育活动促进历史知识文化传播

盘龙城博物馆在开展历史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将公共考古、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相结合，探索历史文化知识面向公众传播的多元形式。围绕“公共考古”和“盘龙城文化”两大主题开发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社会教育活动。其中，“小小考古人考古盘龙城”系列活动通过模拟考古体验、专业考古人员授课和讲解员现场解读等形式，将田野勘探、考古发掘、泥条盘筑等内容融入实践课程，使公众能够在参与考古活动的过程中了解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历程、商代社会生活及相关文化知识。此外，博物馆还围绕考古、制陶和商文明等主题开发社教课程，形成展厅参观、课堂教学与探方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流程，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参与和理解的学习内容。

在研学教育方面，盘龙城博物馆进一步整合遗址现场、展厅陈列与互动体验空间，推出“长江溯源 古城寻根”文化遗产研学项目。该项目设置公共考古、青铜古鉴、陶韵流芳、遗址巡礼四类课程，通过展厅及遗址学习、课堂学习和动手实践三个环节，引导参与者从不同角度认识盘龙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遗址巡礼使公众能够结合城址遗存理解古代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青铜文化及陶器制作相关课程则通过实物观察和实践体验，帮助参与者认识商代手工业发展及区域文化交流。这种以考古成果为基础、以遗址空间为依托、以实践活动为载体的教育方式，拓展了传统博物馆单向知识传播的形式[9]，也使盘龙城所承载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获得了更加具体的公众表达。

在文化传播方面，盘龙城博物馆通过“小小讲解员”等公众参与项目，拓展青少年接触和传播历史文化的渠道。2025 年暑期，博物馆开展“小小讲解员”社教项目，通过文物知识、语言表达、讲解技巧和现场实践等内容的培训，引导青少年在学习文物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参与公共讲解服务。此外，博物馆依托微信公众号、微博及相关网络平台开展线上科普、展厅云讲解等活动，扩大历史文化教育的覆盖范围。由此，盘龙城博物馆逐步形成了以展览讲解为基础、以公共考古和研学课程为拓展、以青少年参与及线上传播为补充的多元教育实践形式。

总体来看，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遗址类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形式，也为公众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特征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知识和实践基础。

五、遗址类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优化路径

第一，推动遗址本体与陈列展示协同，强化证据链式叙事。针对遗址空间与展厅信息可能脱节的问题，可围绕盘龙城城垣、墓葬与重点出土器物建立导览线索，通过原位标识、路线图与展柜信息形成互证关系，以此展示盘龙城与中原商

文化的联系。

第二，探索多模态技术支持下的智能知识体系。有学者提出通过知识图谱、跨媒体融合与语境化解释改善文化遗产叙事[10]。盘龙城博物馆可在考古资料与馆藏著录核验的基础上，将遗址、墓葬、器物、材料、工艺及区域联系建立为关联知识库，以时间轴、地图和器物对照帮助观众理解历史关系。智能问答可以提供分层解释，对观众实行分众化传播教育，以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的教育目标。

第三，将现场研学、参与式沉浸体验与分众教育结合。多模态研究强调个性化叙事、虚实融合和互动参与对文化遗产理解的潜在意义。据此，可围绕盘龙城城址格局、青铜铸造与器物比较开发探究任务，借助经过考古证据约束的三维场景展示遗址不同空间的功能，并区分有据可查的复原与合理想象。不同群体采用不同教育深度，如青少年突出观察和比较，高校群体突出史料辨析，普通观众突出关联讲解，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第四，建立教育成效反馈与内容审核机制。遗址类博物馆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能单纯以社教活动数量或观众互动频次直接替代效果评价。可结合参观前后知识问答、开放式解释任务和自愿访谈，考察观众能否说明盘龙城与其他区域的历史联系、是否理解共同性与差异性，并长期观察文化兴趣的变化。对智能生成内容，应由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协同审核，关注模型偏见、数字鸿沟与信息无障碍问题。评价需区分短期知识收获、意义理解与稳定认同，审慎处理自陈态度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差异。

六、结语

遗址类博物馆应充分发挥考古遗址、历史文物与文化空间的独特优势，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抽象的历史事实、文化联系与精神内涵转化为公众可感知、可理解、可参与的具体教育内容。通过加强历史遗存的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深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叙事阐释，创新公众教育与文化体验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公共文化服务全过程。以盘龙城博物馆为代表的遗址类博物馆，应立足历史实证，丰富教育载体，深化价值引领，在历史认知中增进文化理解，在情感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在教育实践中提升育人实效，真正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形、有感、有效。

参考文献：

[1] 陈蜀西,褚楚. 有形有感有效：博物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J].民族学刊,2024, 15(7):32-38+149.

[2] 刘春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博物馆建设进路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 (6): 28-36+182.

[3] 沈宁. 共同体构建的当代路径——从博物馆身份认同和记忆角度分析 [J]. 民族学刊, 2021, 12 (6): 68-76+123.

[4] 雷英.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 [J]. 博物院, 2026, (3): 98-104.

[5] 刘建宏. 交互叙事下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展陈设计研究[D]. 湖北工业大学, 2026.

[6] 徐少华. 论盘龙城商文化的特征及其影响 [J]. 江汉考古, 2014, (3): 61-66.

[7] 温超然. 叙事学视域下博物馆展陈设计研究: 以盘龙城博物馆为例[D]. 武汉工程大学, 2024.

[8] 燕海鸣. 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 [J]. 中国博物馆, 2013, (3): 14-18.

[9] 韩晓明,乔凤杰,杨慧. 博物馆的空间与记忆叙事对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形塑——以中国太极拳博物馆为例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 125-133.

[10] 魏立才. 叙事、认同、沉浸：多模态大模型赋能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推进策略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 (1): 31-39.